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本卷主编 张荣明 董志广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本卷主编 张荣明 董志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张荣明,董志广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9396-0

I. ①中… II. ①张… ②董…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810 号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本卷主编 张荣明 董志广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Tongshi · Wei-Jin Nanbeichao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36 插页 3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16 000	定 价	1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这套九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终于出版了，关于这套书的旨趣，在综论卷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不再重复。这里只说几句有关的题外话。

1949年以前政治思想史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这与当时很多高等院校设有政治系以及社会热烈议论政治有极大关系。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随着政治系基本被取消和政治一元化的强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被边缘化，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有一点点观照。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几位还默默坚守在这个领域，且主要是近现代史，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由何干之主持，接续了香火，功莫大焉！

作为一门学科重新启动，应该说是与20世纪80年代陆续恢复的政治学学科设置和倡导社会思想解放相伴。

就我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初涉中国思想史时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他在“序言”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想到，研究历史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则无所归。后来又读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钱穆当时是被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说的中国的士人以政治为宗教，对我也很有启发。

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的作用太大了，君主对所有臣民和整个资源具有最高的掌控权，王权支配社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与之相应，政治思想必然处于社会观念的主导地位，而王权神圣则是其核心。因此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就很难解析中国历史的真谛。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盘桓，而反思“文革”中封建主义观念登峰造极的大泛滥，又给我以“使命”感。1984年拙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了，我自认为此书突破了把政治与阶级性等同的框框，提出政治不仅有阶级性，还有社会性。全书没有给任何一位思想家戴阶级的帽子。同时还提出，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即是君主专制主义，先秦诸子争论的主流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主义，这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基础。应该说这两个主要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

有两次会议对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起了明显的作用：一次是1985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另一次是1987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学术讨论会”。承办者都是政治学系，我作为行外人（历史系）也忝列发起者之中。

政治思想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我置身于历史学，这样就出现了学科与人身归属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想申请一个多卷本的项目，由于项目在政治学范围内，而我人却在历史学，历史学又没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项目，因此两次申请皆因学科畛域等问题而被否决。其实我完全有机会移身到政治学去，但我的根底在历史学，不能为项目移身，又不能更改我的研究方向，只好蹒跚地坚持走自己的路了。

说实在的，要想搞大一点儿的项目、吸纳较多的人参加，没有必要的资金支持还真的有很多难处。所以搞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设想一拖再拖，但我从来没有灰心。相信机会会有的，但我的原则是“不期而遇”。

2005年前后教育部要在文科组建创新基地，可我已临近古稀，即将退休。我是一个“好事”之徒，退休与否与做事不相干，我提议组建一个以“思想与社会”为名的基地，此意得到南开大学学校领导、历史学院和文科各系的支持。说来也巧，竟然被批准了。我有幸被诸位老弟推举为首席专家，于是组织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机会真的来了，可以说是又一次“不期而遇”。

我虽任总主编，起了一点儿发起和组织的作用，也举行过多次研讨会，但参加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其中多位是博士生导师，对如何撰写由他们自行其是。我所做的主要是催促进度。由于他们都是忙人，催促的效用也有限，直到2012年才把稿子集齐。

我们一群人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位同仁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这里仍需深深感谢他们再一次的鼎力支持和理解！从扶持学科发展来说，他们承继了何干之的精神！

刘泽华谨记
2013年岁末

目 录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	1
第二节	该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4
第三节	该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动趋势	7
第四节	本书结构与内容梗概	12

第一编 魏晋南北朝政治思想的背景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第一节	传统的天人感应政治	23
第二节	传统的道德政治生活	28
第三节	大臣专权与皇权衰弱	35
第四节	士人酗酒与服丹	43
第五节	嘲戏之风	51
第六节	道士阶层的诞生	56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精神与学术风貌

第一节	士人的心态	65
第二节	清谈之风	77
第三节	基于儒学的才性论	84

第四节 道学思想	91
第五节 佛学思想	98

第二编 三国西晋政治思想

第三章 牟子的佛学思想与政治

第一节 牟子对佛教的理解	104
第二节 社会对佛教的排斥	106

第四章 曹操以禅代为特色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政治理想	113
第二节 挟君安民思想	114
第三节 法家人用思想	116
第四节 诛除异己，和平过渡	120
第五节 生命关怀	123

第五章 诸葛亮儒主法辅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以忠君为特色的臣道思想	127
第二节 德才兼备的用人之道	130
第三节 以法治为特色的政治策略	132

第六章 曹魏时期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刘廙论君臣和吏治	136
第二节 桓范的儒家政治思想	141
第三节 杜恕的儒家政治思想	150

第七章 刘劭的人才思想

第一节 外貌特征与内在本质	163
第二节 人才的分类	164
第三节 人才的优劣	165
第四节 对人才的鉴识	167

第五节 鉴别人才的七种失误·····	169
第六节 玄学思想因素·····	170
第八章 何晏、王弼引道入儒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何晏由儒入道的政治思想·····	173
第二节 王弼对《老子》思想的全面阐发·····	180
第九章 阮籍亦儒亦道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底色·····	203
第二节 现实政治批判·····	208
第三节 心理抑郁和精神危机·····	211
第四节 生命关怀与渴慕神仙·····	213
第五节 道教思想的外衣·····	216
第六节 思想历程与双重品格·····	219
第十章 嵇康亦道亦儒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思想因素·····	223
第二节 道家思想因素·····	226
第十一章 傅玄的儒家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道德观念·····	232
第二节 儒家政治方略·····	235
第三节 对法家的抨击·····	241
第十二章 晋武帝以儒术治国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以孝治天下·····	244
第二节 敬德教民·····	251
第十三章 郭象的独化政治思想	
第一节 万物独化的宇宙论·····	257
第二节 无是无非的知识论·····	267
第三节 非圣非君的政治论·····	276

第四节	淡薄功名的人生论	285
第五节	任其自然的生命论	298

第三编 东晋南朝政治思想

第十四章 葛洪的道隐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政治诉求	310
第二节	现实的困境	323
第三节	道儒兼综	333
第四节	葛洪思想的历史定位	337

第十五章 孙绰儒道佛混合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思想	342
第二节	道家思想	345
第三节	佛教思想	347
第四节	三教关系思想	348

第十六章 陶潜的“儒隐”政治思想

第一节	儒家道德观	354
第二节	现实政治的腐败	356
第三节	徘徊于“仕”与“隐”之间	358
第四节	田园之乐	364
第五节	田园之苦	367
第六节	桃源世界	370
第七节	人生观	371
第八节	生命观	375

第十七章 东晋时期的政教关系思想

第一节	东晋前期关于僧人跪拜君王的争论	381
第二节	东晋后期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再争论	383

第十八章 梁武帝由儒入佛的政治思想

- | | | |
|-----|-------------------|-----|
| 第一节 | 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 | 394 |
| 第二节 | 宗教思想及实践 | 406 |
| 第三节 | 一身两面的“皇帝菩萨” | 420 |

第四编 北朝政治思想**第十九章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思潮**

- | | | |
|-----|---------------|-----|
| 第一节 | 政治改革及思想 | 430 |
| 第二节 | 经济改革及思想 | 443 |
| 第三节 | 文化改革及思想 | 448 |

第二十章 周武帝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政治思想

- | | | |
|-----|-----------------|-----|
| 第一节 | 以汉族文化正统自居 | 464 |
| 第二节 | 宗教政策及思想 | 478 |

第二十一章 刘昼以儒为主杂合诸家的政治思想

- | | | |
|-----|-----------------|-----|
| 第一节 | 刘昼与《刘子》 | 488 |
| 第二节 | 以儒为主的政治思想 | 493 |
| 第三节 | 由儒入道的人生观 | 507 |
| 第四节 | 杂合各家的学术思想 | 518 |

第二十二章 颜之推以家庭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 | | | |
|-----|------------|-----|
| 第一节 | 论家庭 | 526 |
| 第二节 | 论家礼 | 529 |
| 第三节 | 论做人 | 534 |
| 第四节 | 论才艺 | 542 |
| 第五节 | 论做事 | 549 |
| 第六节 | 排玄崇佛 | 554 |

参考文献

后 记

导 论

魏晋南北朝是指自魏文帝曹丕建魏代汉（220）至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589）以前约370年的历史，其间历经魏、蜀、吴三国的分立，西晋的国家统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南北割据；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北朝历经北魏及此后东魏与西魏并立、北周与北齐分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就是指该时期关于治理国家的学说及实践。在中国古代，国与家密不可分，治国平天下与修身齐家紧密相关，由此造成了政治学说的弥散性，既包括基于官方立场的政治理论，也包括基于民间立场的立身治家思想，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

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思想的研究，过去学界做了不少工作，但同对中国古代其他时期政治思想的研究相比，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以及历史走势均不大清晰，存在的学术空白和学术问题较多。本书的工作是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时期政治思想最重要的问题做初步的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描述其宏观面貌和变动轨迹。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

经过学术界近百年的开拓和清理，魏晋南北朝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使原本一片荒芜的学术领域得以展现出基本轮廓。无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①，还是在一般的思想史^②、哲学史著作中^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事

① 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徐大同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② 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魏晋南北朝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③ 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件在宏观上通常被概括为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名法和名理思想、魏晋玄学思想、儒教思想、道教思想、佛教思想、儒道佛三教之争、北朝的汉化思潮。围绕其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一些学术论文。其中，玄学成为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时代政治思想的基本风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但与此同时，同其他各个历史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又是最为薄弱的环节，“迄今尚缺乏具有权威性的学术专著”^①。不仅如此，对该时期一些基本政治思想事件的认识依然朦胧不清，对一些思想事件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曲解，并进一步导致了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思想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的异见。

关于魏晋玄学的内涵、性质和地位问题。学术界普遍注意到，魏晋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② 这样的概括固然不错，但不够全面、深入。就思想内涵而言，魏晋时期的一些玄学家，或是讨论养生（如嵇康），或是从事养生的实践（如士人服丹）。可以说，对生命的关注是魏晋玄学的要素之一。反对名教、崇尚自然、注重生命是构成魏晋玄学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而对生命这一主题的忽视正是过去玄学研究过分“哲学化”的缺陷所在。学术界还普遍注意到，就总体特征而言，魏晋玄学是儒家思想中注入了道家思想（后来还有佛家思想）的因素，是儒道（或儒道佛）合流。问题是，注入儒家思想中的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因素？人们往往说：这个“道”是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道家哲学是一种关注自然的哲学。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自然主义哲学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的具有古典特色的宗教思想，它是汉晋及后来道教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因此，就思想要素而言，魏晋玄学既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因素，也有道家思想或宗教思想因素，是二者的混合体。关于魏晋玄学的性质，很多学者认为魏晋玄学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使魏晋时期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魏晋玄学用道家思想反对儒家思想，对两汉经学思想和官方名教产生了很大冲击和破坏，但破坏名教未必是思想解放，深层分析可以发现，它所导致的

^① 葛荃主编：《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12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② 参见容肇祖的《魏晋的自然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刘大杰的《魏晋思想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许抗生的《魏晋玄学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王晓毅的《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3）、余敦康的《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汤一介的《魏晋玄学论讲议》（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

是思想保守。先秦道家反对儒家，反对礼乐制度和人类文明。儒家不过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道家的理想世界是“小国寡民”，甚至是“与禽兽居”，比儒家保守得多。因此，魏晋玄学所引发的“无君”思潮，并非一种文明的思想倾向，相反是一种反文明倾向。关于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问题。当学者们说魏晋玄学开启了思想解放格局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两晋南朝思想界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态势，即道教和佛教的流行。就士大夫思想层面而言，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儒道佛混合性的思想，成了东晋南朝士大夫走向道教和佛教的桥梁。也就是说，魏晋玄学是从传统儒学向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过渡的中间环节。从本质上说，魏晋玄学非但没有真正促进当时的思想解放，相反，造成了士大夫思想的宗教化和去政治化。

关于道教思潮与政治思想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本土道教兴起和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士大夫道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世俗性，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有出世性，具有排斥现实政治的倾向。从东汉晚期的《太平经》，到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均是如此。《抱朴子》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讨论宗教修行，《外篇》讨论安邦治国，但葛洪认为《内篇》比《外篇》重要，生命比功名利禄根本。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着重于探讨葛洪的宗教思想^①，也有学者偏重于讨论葛洪的政治思想^②。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在早期道士身上兼具上述两类互不相容的思想因素，这两类思想因素中哪一类是旧的因素，哪一类是新的因素，其未来思想动向如何。这些都是目前学界没有全面回答的问题。要回答上述问题，不仅需要考察该时期道教思想与玄学的关系，还需要考察该时期道教思想与隐逸风气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理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

关于佛教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中迅速蔓延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冲击，既涉及经济、政治层面，也涉及思想文化层面。在以往的研究中，佛学研究者往往偏重于研究佛学义理^③，而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主要讨论由佛教的传播而引发的政治事件，至于佛教思想与政治思想的

① 参见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参见许抗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载《学术月刊》，1985（1）；卢央的《葛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有专章讨论了葛洪的政治思想。

③ 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李世杰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郭朋的《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汉魏两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内在关系，则讨论不多。比如，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国社会中迅速蔓延并逐渐超过道教，为什么佛教会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造成严重冲击，佛教到底有怎样的固有功能，均缺乏必要而深入的阐述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佛学研究与政治思想研究之间的彼此隔绝，以及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对佛学的生疏。比如，有人提出佛教是为世家大族统治服务的。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东晋南朝的政治一直处于颓势？为什么个别皇帝也要出家？这涉及对佛教基本属性的认识。显然，上述判断似是而非。

关于儒道佛三教之间的关系。这是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中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其中，学者们讨论了灭佛与兴佛、形神关系、僧人是否应该礼敬王者、夷夏黑白之争、因果报应等。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固然重要，但对儒、释、道三教之间关系的判断，却存在着严重的学术问题。比如，有些学者认为“三教之间的关系是以儒为轴心或主导，而以佛道二教为辅翼”，并把“佛教经学”作为当时“统治思想”的“两大势力”^①之一。诚然，宗教具有精神安慰的作用，在客观上使社会和谐稳定，这也正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断言的根据。但问题是，稳定社会是佛教追求的目标，还是其副产品？因而，佛学能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的原则问题。

以上我们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思想研究所涉及的最核心问题作了简要回顾，类似问题很多，不再一一赘述。不难看出，对该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有必要做进一步发掘，对该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大趋势也需要重新研判。

第二节 该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呈现为两大格局：一个是以魏晋南朝为政治主体的传统华夏民族的政治思想，另一个是以十六国和北朝为政治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思想。南方汉族政权污蔑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索虏”，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则咒骂南方汉族政权为“岛夷”。这两大政治思想格局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差别。不区分这两大政治格局，难免会模糊隋唐政治思想的渊源和特点。

魏晋南朝政治思想的基本状况是，儒教、道教、佛教三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并存，彼此之间既相互矛盾冲突，也相互渗透融合。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904、9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儒教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官方政治学说和社会意识形态，故当时的人们又称之为“名教”。名教的基本特点是秉承三纲五常，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即尤其重视君臣父子秩序和忠孝道德。从理论上说，只要存在社会和政治，就必定存在官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意识，这是儒教存在的基本前提。虽然在此期间的个别时段儒教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总体上说，儒教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官方政治学说。汉末建安时期，在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楨的思想中，虽然不无感伤情绪，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汉代士大夫精神的底蕴。三国西晋时期，在最高统治者层面，在诸葛亮、晋武帝的政治思想中，忠孝乃治国之常道；在士大夫层面，则有桓范、杜恕、傅玄等人作为忠臣孝子的楷模。即便在儒教相对衰落的南朝时期，以虞愿、郭祖深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仍然是维系皇权政治的中坚力量。

道教是以生命神学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本土宗教。魏晋南朝时期，士大夫外丹道教相对发达，下层民众的符箓道教相对低迷。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反映外丹道教的代表性著作。葛洪认为，对于士大夫来说，安邦治国之术乃立身处世之本，需要学习和掌握治理国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与此同时，他又主张人生最重要的是生命，摆脱生老病死的困扰，实现羽化成仙，享受永恒的快乐和幸福，乃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追求。在一时的功名利禄与永恒的生命之间，功名利禄是外在的和次要的，生命才是根本利益。因而，外丹道教虽也谈政治，但却是次要的。符箓道教起自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晋时期的灵宝派道教乃符箓道教的重要分支之一。该派以《灵宝经》为根本经典，就思想特征而言，重在拜神读经祈祷。《灵宝经》宣扬宇宙中有三界三十二天，每一个世界都由神灵主宰，而整个宇宙世界的最高主宰是元始天尊，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元始灵书》被说成是记录元始天尊神秘旨意的核心经典，只要坚持诵读《元始灵书》并斋戒，最终就能得到元始天尊的拯救，超度到天国，过永恒的幸福生活。《灵宝经》不谈安邦治国和政治伦理，但也不反对政治伦理，这是灵宝派道教思想的特点。总之，道教是中国本土自发产生、以生命为根本旨趣、去政治化的个人信仰体系。

佛教是以生命神学为本质特征的外来宗教。在古代印度，佛教是一种彻底出世的宗教。它脱离世俗政治及伦理，主张过苦修的山林生活。两晋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类是士人阶层的佛教，另一类是下层民众的佛教。士人阶层的佛教，主要表现为学习佛教经典，讨论佛学理论问题。当时士人佛教徒研读的佛教经典有《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由于对佛经的理

解不同，当时形成了般若学的所谓“六家七宗”，如心无宗、本无宗等。随着对佛教认识的深入，一些士人逐渐走上宗教修行道路，并出现了一批中国本土的佛教僧侣。下层民众的佛教，主要表现为念佛、诵经、忏悔、祈福。对于下层民众来说，他们通常不讨论般若、涅槃问题，而是关心自身现实和未来命运。他们所理解的佛教教义，主要是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和善恶报应等问题。他们虽祈求当下的福祉，但也默认现实生活的苦难，渴望通过来世的幸福得以补偿。这一补偿机制以行善积德为代价。此一思想内容，在净土信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与三教并存的是士人阶层的分化和士人心态的多样化。魏晋南朝的士人可粗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士人洞悟世事之变，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坐享利禄，如王戎；第二种类型的士人秉持儒家传统，但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变，如傅玄；第三种类型的士人难以与时俱变，执着于传统的纲常名教，与政治现实陷入对立，出现精神危机，为了排解心理抑郁，他们走向老庄，兼摄儒道，如阮籍和嵇康；第四种类型的士人完全不能与时俱变，对现实政治不满，从官场上淡出，隐居田园不再入仕，是为儒隐，如陶潜；第五种类型的士人看破红尘，身兼儒道，但以道家思想为主，淡泊名利，看重生命并修行道术，成为道士，如葛洪。这是大致的逻辑分层，实际情形则复杂得多。

三教并存必然导致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冲突的原因在于，儒教讲现实人伦秩序，鼓励人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道教、佛教告诉人们尘世苦短，功名利禄如粪土，不需贪恋，生命重于一切，应该看破红尘。因而，儒教与道教、佛教之间的冲突是根本的、结构性的，水火不容。这两类异质的思想体系并存，导致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矛盾：个人思想内部异质思想因素之间的矛盾，士人阶层内部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矛盾，士大夫群体与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之间的矛盾。在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时常看到儒家士大夫与宗教人士之间的争论。在政治现实方面，佛教徒的增多导致国家赋税和劳役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于是要求限制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政治伦理方面，佛教虽然在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下不得不在忠孝观念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僧人是否礼敬王者和奉行忠孝之道等根本问题上与名教发生激烈冲突，并使儒教做出一定程度的宽容。道教与佛教之间虽然是同质的宗教，但宗教本身要求信徒保持虔诚的信仰，在虔诚的佛教徒与道教徒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在南朝时期，这一矛盾冲突是以中国文化是否需要外来文化为论题发生的。道教以中国本土文化自居，排斥外来的佛教；而佛教则以自己的博大精深和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

来表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东晋南朝时期，三教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冲突导致了社会分裂，也促进了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

十六国北朝政治思想的基本状况是，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与汉族的政治文化并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与东晋南朝华夏“正统”文化不同，北方地区主要是由北部边远地区徙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十六国时期，所谓的“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到北朝时期，则有鲜卑人建立的后魏（北魏、东魏、西魏）以及由此禅变而来的北齐和北周。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既延续着各自原来的文化传统，也吸收了新的汉族文化因素，从而呈现出一种交错复杂的政治思想状态。

第三节 该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动趋势

与南北两大政治格局紧密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发展趋势也表现出区域性特征。在华夏文化占主体地位的南方地区，以儒家为主导的官方政治思想逐步走弱，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宗教思潮日益流行；在少数民族文化占主体地位的北方地区，各少数民族政权从最初的民族仇杀逐渐走向华夏文化，最后发展到与南方王朝争夺汉族文化主导权。

魏晋南朝政治发展的趋势是，伴随着地方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力量的壮大，皇权日益削弱，二者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制衡局面。投射到政治思想领域的表现是，名教走弱，伴随着三国时期短暂的名法思潮之后，先出现了道进儒退、二元并存的早期玄学思潮，随后引发了大规模的道教和佛教思潮。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时期。

东汉晚期，宦官专权，士人横议，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事件。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皇帝之所以支持宦官，是为了削弱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力量，维护皇帝对国家的主导权和控制权。^①然而，宦官专权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腐败和政治危机，直接促成了汉末清议思潮的发生。清议思潮的真相是，一部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败坏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于是逐渐从政治权力中心淡出，转变为针砭时弊，臧否人物。这是汉晋思想转型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告诉我们，那些清议的士人仍然对政治抱有期望，人在乡野，但心在

^① 参见李光霁：《关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1（3）。